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与应对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 苏冠英 武汉大学

摘要:美欧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相对获益“受损者”角色导致其国内保守主义抬头,而相对剥削感的代际累积性增强又不断酝酿出对全球化不满的民粹力量,二者合力生成了这股反全球化逆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部退潮和经济区域化的持续加深是当前全球化进程调整的双重表现。凝聚多边主义的全球共识、贯彻均衡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层次分明的循环网络和顺应潮流地推动国际经贸体制改革是应对全球化进程调整的争取方向和战略抓手。

关键词:逆全球化;分配驱动;均衡共享

美欧发达地区在近年来掀起了 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逆流, 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黄马甲运动以及数个欧洲民粹政党先后上台执政等事件都是这股逆流持续泛滥的直接体现。借助民粹力量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精英为回应这股“民意”而出台了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全球化进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波全球化, 国际社会缺乏领导、国家之间以邻为壑和各自为战的历史曾多次上演。曾经的全球化推动者却演变成了现今的反对者, 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派生现象

全球化(globalization)实质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的优化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因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

播而导致世界各国在以经济为主的诸多领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逆全球化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是封闭的过程。而反全球化现象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生, 当反全球化力量积累到超越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之时就被视为逆全球化。这三类经济现象往往繁复交织在一起:就进程而言,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伴而生, 从出现伊始就是一体两面;就结果而言,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则相反相对, 二者力量此消彼长;就动力而言, 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根同源, 均由分配不均驱动。

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贡献了有力的理论注解。不过,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辩护时却有意忽略该政策所创造的分配效应, 即自由贸易会导致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间的收益分配不均。换言之, 反全球化逆流由全球化进程所创造的国家间相对获益不均而生成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而生成的民粹主义两股力量合流所驱动。在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间的经济增长不同步会导

致相对获益较少者的保守主义抬头, 而相对剥削感的代际累积性增强又酝酿着出对全球化不满的民粹力量不断滋长, 二者合流并借助政治选举、游行示威等渠道反精英、反建制和反全球化诉求。当然,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自动化和劳动代替也是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攀升、行业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晚年也表示当贸易双方都在技术进步, 进步快的一方将对慢的一方产生持续性损害, 修正了李嘉图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二、美欧反全球化逆流的生成逻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东升西落、南升北降”趋势引发了美欧国内保守主义阵营对既往经济政策的隐忧以及对全球化有关议题的辩论和反思。以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为例,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以及欧盟整体的经济规模均不及2008年。美国2019年的经济虽然相对2008年增

[作者简介]苏冠英(1996—),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长了 47%，但 GDP 全球占比却不及 2000 年。除美国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至少要到 2023 年前后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群体性崛起。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相较中国、印度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印度和韩国 2000 年的经济规模仅占美国的 10.19%，至 2019 年提高到了 21.08%。疫情背景下的美国经济在 2021–2022 年相较中国而言下降更为明显。

这股反全球化逆流内生于新自由主义，却也反噬了新自由主义。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倒置的第二意象”强调国际社会是运行在国内社会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国家的对外政策植根于国内社会而非单纯受国际体系的结构约束。这轮反全球化逆流在美欧地区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嗅觉最为敏锐，高技术工作者的经济创造力也更加突出，而普通劳动者往往会沦为由时代浪潮裹挟前进的被动角色。经济全球化成了美欧财富精英的“全球避税化”，普通劳工阶层却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收益受损方。以美国为例，自 1983 年以来高收入家庭与中低收入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即便在经合 (OECD) 成员中，美国的贫富差距也相当突出，前 10% 的家庭占有 79.5% 的社会总财富，后 60% 的家庭仅占有 2.4% 的社会总财富。中下阶层经济状况的不断下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激化，滋生了深厚的民粹主义土壤。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前的 2015 年，美国贫困率比 2007 年经济衰退最严重时还高 1%。美国畅销书《乡下人的

悲歌：危机中的家庭与文化回忆录》(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所描述“乡下白人”与孩子们所面临的家庭争吵、暴力、酗酒、精神创伤以及难以摆脱的贫穷困顿，就是对特朗普获选民意基础的生动写照。事实上，欧债危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中东难民危机等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子。深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部分拉美国家深陷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的中东国家难以摆脱“资源诅咒”。“阿拉伯之春”就是新自由主义席卷中东后煽动民粹力量对中东国家政治体系进行的一次结构性“改造”，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又成了部分欧洲国家民粹政党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的重要背景。社会中下阶层借助总统大选、“脱欧”公投和游行示威等渠道，释放了一股声势浩大、解构性强的“反全球化 – 反精英 – 反建制”力量。

美欧地区的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包括产业转移及业务外包所引发的失业群体、与跨国移民和入境难民竞争工作的当地居民等都是反全球化的代表力量。美欧民粹领袖将其遭遇的困境归咎于既往的经济全球化政策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在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当选后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修筑隔离墙、发动多起贸易战、逼迫盟友提高军费摊派比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多边主义安排以及迫使世贸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等，就是对既往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与演进趋向

(一)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调整

世界银行 (WB) 将世界市场形成以来的全球化划分为三波，即 1870–1914 年的全球化第一波、1945–1980 年的全球化第二波和 1980 年代至今为全球化第三波。若以主导国和引领思想为标准，又可将其划分成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英国主导的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一波相重叠，刚刚经历拓荒时代的世界市场建基于帝国 – 殖民体系之上，以东印度公司为经济载体，实行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本位制，而自动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极大限制了各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自主性，资本主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轮全球化进程。

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又可分为三个进程。第一程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二波相一致，世界银行 (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关贸总协定 (WTO 前身) 作为协调和管控成员国货币政策、发展资金和贸易分歧的重要平台，修正了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部分弊端，兼顾了各成员国利益和民众福利。冷战终结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引领的美式全球化进入 2.0 时代，大体等价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全球化第三波。东西方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板块逐渐融合统一，以跨国公司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高度互嵌、深度融合。不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2.0 所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所创造的